

美国吸引外来人才政策的演变与效用^{*}

梁茂信

摘要 吸引外来人才是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它滥觞于殖民地时代以来的移民政策史,并随其发展而不断演进。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运动的迅速展开,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本世纪20年代移民限额制度的形成和吸引人才政策的产生。从此之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招贤纳士的政策日臻缜密,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十分完整的机制,为美国吸引了大批的外籍人才,对美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美国 外来人才 技术移民 移民限额制度

吸引外来人才是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以各种方式鼓励外国的德才兼备者移民美国,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未予足够的重视,为此,本文拟对其作认真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

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源于殖民地时代以来吸引外来移民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美国的决策者对外来人才这个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在心理上和实践上,他们都偏爱那些德才兼备的移民。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初,大量吸引外来移民,增加美国人口与劳动力供给,发展社会经济,是美国历史的主要趋势,所以择优选用、唯才是举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作为一项专门政策确立下来,而是包含在政府奉行的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之中。在殖民地时代,为了加快荒野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各殖民地在竭力鼓励外来移民的前提下,主张优先吸引那些经济条件优越、社会道德良好、且有一技之长的移民。譬如,弗吉尼亚殖民地禁止罪犯、乞丐和无业游民等“不受欢迎”的人入境,欢迎地位较高的绅士以及“那些地位低于绅士即自耕农和同类的、有良好教养和勇敢精神的人们。”^①马萨诸塞的条件更为苛刻,它只鼓励“素质较

^{*}香港中文大学“西方社会与教育科学之应用合作研究计划”赞助课题。

高的有用之人”^②入境。当然,为了吸引更多的移民劳动力入境,各殖民地普遍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廉价出售土地,允许相对宽松的宗教自由,给予成年自由男子以较多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在此基础上,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还为初来乍到者免费提供农具和粮种,对那些既是移民又自愿招募移民的人给予丰厚的奖金。创建最晚的佐治亚殖民地不仅免费向移民提供交通和生活必需品,而且还率先放宽了对移民拥有土地面积和财产继承权的限制。上述政策的实施,对欧洲那些备受压迫和剥削人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因此,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和北欧等国的移民漂洋过海,纷至沓来。移民的到来增加了殖民地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为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建国初期,年轻的共和国位于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处于英、法和西班牙的殖民地的包围之中,边疆地带常受土著印第安人的袭扰。这种四面楚歌的严峻形势使美国的开国元勋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加快人口和经济的增长,美国随时都会面临任人宰割的危险。因此,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都认识到吸引欧洲移民尤其是德才兼备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担心,在欧洲封建制度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移民不能领会美国共和政府的原则,因而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会构成威胁。在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华盛顿。他在给约翰·亚当斯的一封信中曾明确表示:“关于外来移民,我的观点是,除了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种类或有特定职业的人以外,其他人则无需鼓励。”^③他之所以不主张鼓励整批的群体移民,主要是因为他相信,外来移民来到美国后会聚居在一起,会保留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会有碍于美利坚民族对外来移民的同化和美国社会政治一体性的发展。同样,以民主思想著称的杰弗逊也主张吸引欧洲的有用之才,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工匠和自耕农,他既不愿意接受“放荡不羁、缺乏道德的工匠”,也反对大批群体移民。在他看来,缺乏道德的工匠是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而群体移民聚居在一起后会利用美国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权利,把欧洲古老的封建思想和原则掺入美国的立法之中,从而使其“变成杂七杂八的、支离破碎的、胡里胡涂的一堆东西。”^④相形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思想最为开明。这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因才华出众而被委以美国历史上首任财政部长后,于1791年12月在给国会的《制造业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吸引外来移民对美国工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富有远见地指出:“移民不仅是扩充人口的重要来源,也可以为国家提供有用的和充沛的劳动力。”因此,“打开每一条可能的外来移民之路,是美国的利益之所在……”^⑤

然而,由于开国元勋们缺乏统一的认识,美国的客观现实也确实需要外来移民补充其劳动力不足,所以,联邦政府既没有关闭国门,也没有制定明确的鼓励政策。在这种自由放任的背景下,美国各州尤其是人口稀少并急于加入联邦的西部准州都相继制定了吸引移民的优惠政策。各地的政府官员、船运公司、铁路公司和企业主等或派人去欧洲招募移民,或动员本地居民说服其在欧洲的亲属移民美国。另一方面,引起传统经济结构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工业革命在西北欧国家相继展开,那些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被本国就业市场所吸收的人们则不得不移居美国。到19世纪末,促使西北欧移民迁居美国的诸种因素也开始在东南欧国家发挥作用,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传统经济也在西欧殖民主义贸易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因此,数以百万计的亚洲和东南欧移民失去生活保障后也加入了迁徙美国的行列。据美国政府统计,1820~1924年迁入美国的移民达3464万,相当于1790年美国人口的9倍。^⑥随着美国人口增加,美国的“自由”土地到1890年已不复存在,劳动力供求关系日趋平衡,就业竞争日益加剧。同时,工业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日新月异地改变着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各种对抗性的矛

盾也随之空前加剧: 罢工高潮迭起, 农民运动此起彼伏, 排外主义骤然泛滥, 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狂飙。为了维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地位和既得利益, 确保美国白人与其他民族业已形成的主次关系, 美国政府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 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外来移民的立法。1882 年《排华法案》实施后, 1907 年又通过“君子协议”限制了日本移民。1924 年, 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旨在彻底禁止亚洲移民、限制东南欧移民的移民限额法。它规定, 每年的移民限额为 15.3 万, 其中西北欧国家占 83% 以上, 东南欧国家为 15% 左右。值得注意的是, 法案规定优先吸收美国公民的外籍亲属和精于农业耕作技术的移民及其配偶和子女。

美国国会之所以把精于农业耕作技术的移民列为优先入境的原则, 主要是因为 19 世纪工业化运动全面展开以后, 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工业发达城市。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向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就达 400 余万,^⑦ 结果造成了农业劳动力不足。因此, 国会把精于农业耕作技术的农民视为国家急需之人才。虽然这种界定失之狭窄, 没有顺应工业化发展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形势, 但它毕竟标志着吸引外来人才的原则被纳入政府法律的开始。从此, 吸引外来人才就成为 20 世纪美国移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对移民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 其中最重要是 1952 年、1965 年和 1990 年移民法。1952 年法案在保留 1924 年移民法条款的基础上, 将每年的总限额略增到 15.6 万, 其中的 50% 将用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突出才能和技术专长的移民(以下称“技术类移民”)。在地域上, 除每年给予亚洲各国 100 名移民限额外, 欧洲各国的限额比重保持不变。显然, 亚洲和东南欧移民仍是美国限制的主要对象。

1965 年, 美国政府根据其社会发展的需要, 颁布了新的移民法, 每年的移民限额增至 29 万。虽然技术类移民限额的比重降至 20%, 但是, 由于总限额较之于 1952 年法案增长了近一倍, 因而技术类移民的绝对限额减少幅度不大。同时, 由于新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等条款, 有色种族的移民可以在与白人相同的条件下入境。因此, 1965 年移民法实施后, 不仅入境移民逐年锐增, 而且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成了美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据美国政府统计, 60 年代的入境移民为 332 万, 70 年代为 449 万, 80 年代为 733.8 万。在入境移民中, 欧洲移民由 60 年代的 37% 降至 80 年代的 9.6%, 西半球移民的比重始在 48% 左右, 亚洲移民则由 13.7% 跃至 38%。^⑧

在同一时期, 美国经济持续低速增长, 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和高科技也受到了日本和西欧的挑战。然而, 由于美国政府认识到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上对推动经济和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 因而它在 1990 年颁布了新的法案, 将每年的移民限额增至 70 万(1995 年后为 67.5 万), 技术类移民限额为 14 万。此外, 法案新设“投资移民”条款, 每年的限额为 1 万, 凡依此条款入境的移民必须在城市或失业率较高的地区投资 100 万美元, 在农村或失业率较低的地区投资不少于 50 万美元。关于技术类移民, 法案除了保留 1952 年移民法的条款外, 对“突出才能”的移民做了明确规定: 即在科技、贸易、教育、体育和艺术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并享有国际声誉的外籍人均属突出才能的移民, 他们入境时必须出示相关的学历或奖励证书等, 否

则不得入境。显然,美国国会希望用这些条款吸引更多的外籍英才入境,并利用他们的技术、智慧和资本来加快美国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从而保持其在国际中的领先地位。

当然,除上述政策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下列方式吸引外来人才。第一,自30年代以来,美国常常在一些国家动荡不安或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频频颁布难民法或实施安置难民计划。它在表面上总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以感人耳目,而实际上只吸收对美国有用的人入境。在30年代纳粹德国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时候,美国政府洞若观火,作壁上观,对于受害难民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拯救措施。只是到1941年法国沦陷后,美国才决定向逃往北非和葡萄牙的难民伸出救援之手,但是,真正进入美国的却是1236名科学家。他们中间除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12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外,另有一大批人在国际上享有同等的声望。^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美国的难民中,除了政治上属亲美势力或敌视社会主义的保守派外,基本上都是经济条件优越或拥有技术专长的难民。譬如,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到1980年美国共安置了80万古巴难民,他们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通晓英语,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因而“构成了西半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才流失。”^⑩同样,在1975年以后入境的50万越南难民中,有2/3以上从事白领职业,其中教授、工程师和经理等占24%,只有5%的难民属于一般体力劳动者。^⑪

第二,根据美国的需要,允许外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教授和专业技术人员永久居留美国。1948年,美国为帮助英、法、德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重建,先后与它们签订了文化交流协议,同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知识与教育交流法》。它规定:凡是在美国修业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学成后应回母国服务两年,否则不得移民美国。然而,在1956年6月4日的法令中,虽然国会重申了上述原则,但同时又规定,凡属美国急需的专业人才可以在司法部长认可后永久居留美国。接着,在1957年的《难民逃亡法》中,国会又规定,凡在1957年1月以前入境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如果担心回国后因政见或其它原因而受到迫害,则可以永久居留美国,其配偶和子女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入境。在该条款实施后第一财政年度内,获永久居留权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逾3.2万人。^⑫上述两项法案中的条款为此后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变通的原则:即根据美国的利益需要,允许一些外籍学生和学者永久居留美国。迄至90年代美国政府运用这种原则接纳了数十万外国留学生和学者。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50年代修改了关于外国留学生的法规,主要原因是:首先,到50年代中期,日本和西欧的经济重建已基本结束,并且在国际贸易中同美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竞争。此外,这些国家的教育机制日臻缜密,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在不断减少,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开始增多。其次,冷战乌云覆盖了全球,美苏对峙日趋激烈,军事和高科技竞争十分突出。美国为了遏制苏联,保持其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遂着眼于未来,大量吸收外国留学生,以充实其科研力量。最后,劳动市场是美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供求关系和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走向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任何积极或消极变化都会影响到在校大学生的专业取舍和职业流向。为了能谋求到更实惠的职业,大学生们都喜欢选择应用性较强的热门专业,而问津基础学科专业者日渐减少,因此许多急需基础学科专业人才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那些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公司等,都把招聘的目光转向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就读的各国留学生中间,多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代表了其国的精华。然而,由于母国工作条件差,待遇低,加上一些国家政局易变,人心不定,因而许多留学生不愿意回国。美国留用外国留学生的政策恰好顺应了外国留学生的心理,致使大批留学生学成后滞留不归。

第三,为了得到它所需要的人才,美国有时还采取了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手法。最典型

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将约两千名德国科学家运往美国。1949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国家安全利益侨民入境法》,授权中央情报局每年利用100名移民限额吸收“那些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或对促进美国情报事业至关重要的外籍人”。^⑭这项法令实施后,美国又将数百名前纳粹情报人员和科学家招进美国并从事情报和军事科研工作。美国政府这种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为世人鄙弃,也令美国人汗颜。

三

就整体而言,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用,对美国社会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1924年美国严格限制外来移民以前,虽然入境移民人数繁多,但整体技术构成较低。按照美国政府的统计标准和方法,我们将1820年以来入境移民潮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820~1898年间入境移民1776.4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士(含教授、工程师和医生等脑力劳动者)为10.16万,商人(含银行家、企业主和商贩等)48.27万,熟练工人(含技术工作、工头、工艺工人和技术操作员等)207万,累计275.6万,占入境移民总数的14.9%。二是1889~1924年间入境移民1763.58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士24.7万,企业主和经理36万,熟练工人236万,公司职员(含秘书和推销员等)29.8万,累计326.4万,占该期入境移民的18.38%,呈上升趋势。三是1946~1970年间入境移民670.1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士58.5万,企业主和经理14.3万,熟练工作85.4万,公司职员69.2万,累计227.6万,占总数的34%。^⑮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1924年以前的入境移民中,单身男性劳动力较多,家庭妇女和儿童较少,因而无职业者的比重较低。譬如,在1889~1924年间的入境移民中,14~44岁(1917年以后为16~44岁)的劳动力,男性和无职业者的比重分别为96.1%、66.9%和30.2%,而在1946~1970年间的入境移民中,这三类移民的比重分别为62.5%、44.63%和54.5%。因此,如果仅对移民劳动力技术构成分析,那么就可以看出,在1949年~1970年间,入境的移民劳动力为418.9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和经理共占17.4%,熟练工人和白领职员共占36.82%,累计54.2%。但在1899~1924年间入境的移民劳动力为1695.8万,其中,同类移民的比重分别为3.57%和15.65%,累计为19.2%。两大时期相比,前者是后者的三倍。^⑯如果我们再以1924年为界标,比较和分析前后两大时期入境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和移民获得的专利证书在美国政府颁发的专利证书总数中的比重,那么它也许更能说明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实际效用。譬如,以10年为单位,1871~1920年间入境移民总数占美国总人口的7.4%,而移民(不包括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后代)在同期获得的专利证书占美国专利证书的7.05%。但是,在1931~1970年间入境移民占美国人口的1.1%,而获得的专利证书占同期总数的18.6%。^⑰

1970年以后虽然入境移民人数逐年猛增,并在80年代接近了本世纪初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移民的整体技术构成也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因为一方面,美国的移民政策限制了那些文化与技术素质较低的移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在迅速提高,这在亚洲地区最为明显。从各国移民的学历看,古巴、牙买加和欧洲各国移民的平均学历为12年,与美国人的平均学历相当。亚洲移民,尤其是来自印度、中国、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移民的学历平均在13年至16年左右,均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⑱亚洲移民较高的学历与文化素质不仅使他们来到美国后能够相对容易地谋到职业,而且

其职业构成也高于美国人。例如,在 25~65 岁的美国人中间,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占 31%,在同龄的亚洲移民中则占 47%,其中,占华人移民的 52%,日本移民的 63%,韩国移民的 42%,菲律宾移民的 50%。但是,由于大多数移民入境时间不长,又面临着环境陌生和种族歧视的挑战,因而其年收入平均水平仍低于美国人。^⑩

美国吸引外来人才政策的实践表明,吸引和利用外来人才不失为缓解其国内人才不足的有效捷径,这不仅为美国节省了巨额培养和教育经费,而且使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外来人的智慧、资本和技术。据统计,1985~1991 年,每年入境的具有美国急需技术的移民为 2.65 万。按 1989 年价格计算,每年入境的这类移民可为美国节省约 20 亿美元的教育经费。但是,在 80 年代入境的移民中约有 150 余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⑪如果将这些移民及历史上的所有技术类移民以相同的方式计算,那么,他们为美国节省的培养和教育经费就必须用天文数字来表述了。

虽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为发展教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外来人才和其他外来移民,美国的经济和高科技就受到很大的制约。信手翻开美国历史,便昭然可见,正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到来,美国才能在 19 世纪末 30 年间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强国。在 20 世纪,美国的高科技之所以能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外来人才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在 40 年代入境的难民科学家中,许多人成为美国原子能和航天工业的骨干力量。在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有不少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是外来科学家。例如,意大利核物理学家费米任高级研究部主任、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负责理论研究部、苏联化学家基卡哥夫斯基任爆炸部主任、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拉比任研制原子弹高级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在美国先后研制了“红石”火箭、木星火箭和木星 C 型火箭。他象其他外来科学家一样,与美国出生的同行密切合作,成功地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气象卫星和通讯卫星。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外来科学家对美国高科技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当今美国学术界、政界和教育界等各个领域的知名者中间都能看到外来人才的身影。据一些美国学者统计,在 80 年代美国各行业持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中有 1/3 是外国出生。到 1992 年美国所有大学理工科教授中有 75% 是外来的,35 岁以下的讲师中有 50% 是外国出生的。^⑫难怪一些美国报刊乐观地评论道:“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是外来移民的天下。”“美国的高科技工业,从半导体到生物技术等,越来越需要移民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以保持较强的竞争力。”^⑬

值得提及的是,在美国所有的移民群体中,唯有华人受到排斥的时间最长,程度也最为惨烈,但是,忍辱负重的华人不甘雌伏,锐意进取,涌现出一大批知名人士。在他们中间,除蜚声海外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和李哲远等诺贝尔奖获得者外,还有人所共知的王安电脑公司总裁、1920 年生于上海的王安,名闻遐尔的建筑设计专家贝聿铭,生于湖南的“超导奇才”朱经武、生于上海的“物理研究第一夫人”吴键雄等。当然,这些才华出众的出类拔萃者只是华人科学家中的一小部分。据统计,在美国的 12 万名一流科学家中间华人占 1/4。在 60 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华人占有所有研究人员的 1/3。70 年代以来,华人占美国著名大学系主任的 1/3 以上,占美国工程机械协会历任主席的 50% 以上。在 80 年代美国的百余万华人中,从事科研和教育的有 8 万多人。^⑭华人被称为美国的“模范少数民族”名符其实,他们已成为当代美国社会中不可低估的开拓力量。

- ① 罗杰·丹尼尔斯:《来到美国:外来移民与美国民族生活中的民族性》,新泽西 1990 年英文版,第 33 页。
- ② 戴尔·斯坦纳:《我们歌颂你:外来移民与美国历史》,纽约 1987 年英文版,第 24 页。
- ③ 马里恩·贝内特:《美国移民政策史》,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63 年英文版,第 7 页。
- ④⑤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14 页,第 16 页。
- ⑥ 美国商业部:《美国历史统计资料:以殖民地时代到 1970 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57 年英文版,第 110~111 页。
- ⑦ 亚历山大·大和等:《亚洲裔美国人》,圣何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英文版,第 184 页。
- ⑧ 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编》,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1992 年英文版,第 11 页。
- ⑨ 罗伯特·迪万:《美国移民政策:1924—1952 年》,纽约 1972 年英文版,第 108 页。马尔德温·琼斯:《美国的外来移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3 年英文版,第 281 页。
- ⑩ 小弗农·布里格斯:《移民政策与美国劳工》,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4 年英文版,第 196 页。
- ⑪ 迈克尔·勒梅:《从门户洞开到选择限制:美国移民政策分析》,纽约 1987 年英文版,第 114~115 页。
- ⑫ 贝内特:《美国移民政策史》,第 202 页。
- ⑬ 罗杰·丹尼尔斯:“美国移民法变化与 1924 年以来的排外主义”,载《美国犹太人历史杂志》1986 年 12 月,第 74 卷,第 2 期,第 170 页。
- ⑭⑮⑯ 美国商业部:《美国历史统计资料》第 8,105~106、110~111、985~956 页。各种结果均依各页表格计算所得。
- ⑰ 莫蒂默·扎克曼:“把你们的智慧交给我们吧”,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0 年,第 109 卷,第 17 期,第 108 页。
- ⑱ 莫里森·王:“1965 年以后的亚洲移民:来源、住地及流向”,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1986 年,第 478 卷,第 160~161 页。
- ⑲⑳ 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资料摘编》第 10 页,扎克曼:“把你们的智慧交给我们吧”,第 108 页;迈克尔·J·曼德尔克和里斯托夫·法雷尔:“外来移民:他们是如何振兴美国经济的”,载《商业周刊》1992 年 7 月 31 日,第 114 页。
- ㉑ 阿勒杨德罗·波特斯和鲁本·朗博特:《外来移民组成的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英文版,第 212 页。
- ㉒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第 273~276 页。另见李长久:“引进人才在美国科技发展中的作用”,载《环球》1985 年第 6 期,第 9 页。

(作者单位 东北师大历史系 长春 130024)

[责任编辑 董铁松]

《德国历史辞典》辞目选登

奥斯瓦尔德·阿弗里德·冯(Auerswald, Alfred. von, 1797—1870) 19 世纪普鲁士改革派人物之一汉斯·雅科比·奥斯瓦尔德的第三子,属老自由派。生于哥尼斯堡。参加过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哥尼斯堡学生协会的负责人,参加了青年民主运动。1819 年担任公职。1830~1844 年任罗森贝格最高行政长官。1830~1870 年间,任东普鲁士省议会、爱尔福特联盟国会和普鲁士议会下院代表。在 1847 年联合会议上要求实现 1815 年允许的宪法。1848 年

3 月 19 日~6 月 14 日任康普浩森——汉泽曼内阁的内政大臣。50 年代是反对曼推菲尔反动内阁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1870 年 7 月 3 日死于柏林。
老自由派(Alfibilere) 以普鲁士政治家格奥尔格·冯·芬克为首的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他们在 1859 年普鲁士下院选举中曾获得多数票,但在 1861 年选举中又败于进步党。以后这个派别逐渐失去影响,分别加入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

(姜德昌)